

我最近花时间将毕飞宇近年来的创作重读了一遍,很有心得,我对毕飞宇说,你有变化,你更“当下了”。他曾在一个文学演讲中将“世态人情”比喻为“小说的拐杖”。他说:“世态人情是要紧的,无论我们所坚持的小说美学是模仿的、再现的、表现的,无论我们的小说是挣扎的、反叛的、斗争的,世态人情都是小说的出发点,你必须从这里起步,你必须为我们提供一个小说的物理世界。”“世态人情不是一个多么高深的东西,这个貌似不那么高级的东西,特别容易被我们这些小说家轻易地丢掉。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会觉得,一旦丢掉,它的麻烦就来了。我特别强调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如果我们要使小说更加有生命力,我觉得世态人情是一根不可或缺的拐杖。这根拐杖未必是铝合金的,未必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它就是一根树枝。有时候,就是这根不起眼的树枝,决定了我们的行走。”他说:“任何时候,小说只要离开了世态人情,必死无疑。”一个曾被人们称为先锋的作家讲出这番话来是发人深思的。

正是这样的世俗情怀使毕飞宇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情怀,体现出描写上的真切和对社会问题的敏感,这在他近期创作中尤其明显。

2009年,毕飞宇创作了短篇小说《睡觉》。作品是一位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小美先是从事色情行业,接着被一位台商包养,并要她为他生一个儿子。金融风暴来临后,台商的包养费也打了折,小说中,小美在遛狗时遇到了一位同样遛狗的小伙子,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大学时期的另一场疑似爱情,小美不禁突发奇想,花钱邀请这个陌生的小伙子与她躺在草地上睡一次“素觉”。作品以轻灵的笔调叙述了我们这个社会已屡见不鲜的“二奶”现象,对小美来说,清纯的爱情已遥不可及,只能于回忆与游戏中怀想,而现实只剩下买卖与欺骗。小说并不止于一般的同情和批判,而在于对人心的深度洞察,台商要小美生儿子,小美却以避孕来“欺骗”,小美为之屡屡觉得对不起“先生”。这已是近乎病态的麻木的悲剧。

2007年,毕飞宇创作了两个短篇,《家事》和《相爱的日子》。《家事》是中学生题材,生动地再现了当前中学生的特殊生态,一种对家族关系的“戏仿”,他们是同学,又是“夫妻、姑嫂、叔嫂,连襟、妯娌和子舅”……近亲与远房,盘根错节,应有尽有。小说虽然写的是孩子们的游戏,但让人深思的问题却不少,升学的压力与生活的单一,

这一现象值得深说。即使是一个人的转型

■聚焦

毕飞宇短篇小说 作为社会关怀的文学

□汪政

独生子女的孤独以及由独生子女这一生育现状带来的血缘关系的单一化趋势,导致了人际关系的松散、家族生活的简化、人情的冷漠等等,在貌似轻喜剧的氛围中让人感到的是无奈与疼痛。

《相爱的日子》的两个主角是一对邂逅的男女毕业生,毕业即失业,他们只能在城市漂着,财富那么多,没他们一分,机会那么多,没他们一个,靠为菜场搬运等零工维持生计,蜗居在廉价的出租屋里,冀盼着没有希望的明天。偶然中,他们相识,除了做爱,连触及感情的资格似乎都没有,遑论谈婚论嫁。小说的结尾,女的只能考虑是否嫁个有钱人了。小说只写了一个二人世界,但折射出的问题同样丰富,作品中的场景与细节设计得非常精到,几乎每一处都让人产生联想,城乡的差别、打工者的命运、成功的压力、教育与就业的失衡、价值的倾斜、底层的艰难、出路与希望等等。相爱的日子是短暂的,相爱的日子其实并未谈及爱,许多读者可能对作品以大量的篇幅去叙述两性的爱有些不解,其实毕飞宇在此中隐藏着一个深刻的悲剧,似乎惟有性爱才能确证两个人的存在,除了身体与性,他们一无所有。

以上这一回放足以看出毕飞宇近期写作的趋向,如果说以前的毕飞宇是关注现实的,那么近期的毕飞宇更关注现实了;此前的毕飞宇所关注的现实可能更为广阔,包含了历史的回望,而近期的毕飞宇将精力集中到了当下,他将自己的创作与社会保持在一个共时性的位置上,使得其作品对社会现实具有了更为直接的阐释功能。社会的许多现象得到了描绘,许多问题得到了反映,既有对弱者的同情,又不乏深刻的批判,这种对现实的近距离的观察如此坚定、一致,构成了毕飞宇创作中一个独特的阶段性现象。

这一现象值得深说。即使是一个人的转型

也不会是偶然的,它必定与文学的整体走向,与社会的总体氛围相关。我想在此提出一个概念,即文学的“社会化”。我的基本判断是,文学开始进入一个高程度社会化时期。这一判断基于两个前提:一是社会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走向开放,社会的公共领域不断扩大,人类活动的社会化日渐明显;第二是文学,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也在不断社会化,在媒体越来越发达,特别是互联网强大的今天,社会为写作与阅读提供了可以称得上是过剩的资源与空间,以前纯粹是个人化的“记事”行为,现在都在公共平台上进行。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日渐突出,个人生活常常深陷茫然与危机,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社会参与的热情、责任与可能性不断增大,终于在不知不觉间促成了文学对社会的新关注,相比起上世纪80年代的纯文学,90年代的年度叙事,当下的文学正以不同的方式直面现实,现场感明显提高,这就是文学的社会化。比如,现在什么问题最大?“民生”最大,社会变化剧烈,阶层起落明显,贫富差距加大,多种矛盾突出,这些问题在文学中正在得到反映,文学亦已开启了“民生工程”,只不过文学的民生工程并不是实践层面的。在一个日益技术化的社会,文学已经学会如何恪守自己的领地与责任,它的社会化虽然紧密地与社会现实相关,甚至与社会热点一一对应,迅即地对重大事件作出反应,对重要的社会思潮进行深度剖析,但它常常体现为理性的批判、道德的诉求、情感的慰藉、精神的追问与灵魂的安顿,我称之为社会关怀,所以,我将毕飞宇近几年的短篇命名为“社会关怀小说”。

如果要寻找这一局部的变化的标志的话,那应该就是2005年的《彩虹》,它是毕飞宇社会关怀小说的开端。倘若硬要用一些明确的概念去概括的话,

《彩虹》关心的是儿童问题和老年问题,而这老少问题又关系到家庭问题。在作品中,老夫妻之所以境况凄凉,小家伙显得那么孤独寂寞,都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家庭未能给他们提供应有的关爱。为了表现这一主题,毕飞宇将目光聚焦到家庭的两类特殊成员上,即老人与孩子。在现代社会中,家庭的生产功能大幅度萎缩,生产与生活资料的生产已基本不再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力与消费者的再生产亦即下一代的繁衍在今天的社会也呈下降趋势。《彩虹》中的老铁是上一辈人,有三个子女,但“小绅士”就只有他一个了。由于生产场所的社会化和社会流动的增加,家庭正由大趋小,老铁这样的家庭,如果换在农业社会时期,可能是三代同堂,如今的四个星散东西,相隔五洲。生产场所的社会化最简单的变化不但使家庭生产者不可能在家庭中从事生产,而且造成了生产者与非生产者的分离,比如父母大都不可能带着子女在工作场所劳动,所以,在作品中,当父亲忙于“挣钱”时,“小绅士”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

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家庭的现代变化本来是有利于家庭成员中的老人与孩子的,但情形似乎并不如此。毫无疑问,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和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传统家庭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都可以得到解决,比如可以通过社会购买,《彩虹》中的“小绅士”的教育就是通过家庭教师(社会购买服务)来进行的,而老伴吴积善病后的困难也可以通过技术(电梯、电动轮椅)来缓解。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生存的欲望、情感的慰藉、人性的需求是多种多样、丰富变化的,并不是每种诉求都可以通过购买、技术以及社会化的方式得到解决。

老铁夫妇退休之后无所事事,按传统的说法,这时应该从社会退回家庭,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但现在儿孙都在国外,而且从作品描写的细节来看,祖孙的沟通已十分困难。老铁除了推着老伴走走,便只能无所事事地待在29层的高楼上。虽然,从理论与理想上讲,建立在血缘与经济共同体上的家庭成员最具情感交流的真实性、同一性、相关性、亲和性与安全性,儿女是老人情感依托的最重要的来源,可惜这一来源正面临着枯竭,因而老年也越来越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孤独,并不止于老年人,还有儿童。《彩虹》中的“小绅士”没有自己富有童心与童趣的生活,他也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既是显在的——他只能一个人待在高楼上,变着花样舔玻璃窗、磕玻璃窗;这种孤独又是隐性的,深层次的——他小小的年纪就将自己变成大人了。他的穿着是成人的,说话也是成人的,思维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判断也是成人的,总是以冰冷的、陌生的、戒备的心理对待他人。比老铁更可悲更值得同情的是“小绅士”对这些似乎并没有什么自觉的意识,老铁的孤独是被自己感受到的,而小男孩的孤独则是麻木的。但不管自觉与否,在现代家庭模式中,他们都是被抛弃、被忽视、被误读的群体,也是靠自身无力改变命运的弱势的一方。一个有限的短篇,竟然将这弱势的两极都写到了,老少相遇,并不是为戏剧性的情节,更重要的是表达他们的孤独无助,因为都有了孤独,才会促使他们走到一起,因为无助,他们才互相帮助,这老少间架起的“彩虹”没有任何诗意的美丽,而是干涸中的相濡之沫。这样的结构,这种弱者的相遇成为毕飞宇近期社会关怀小说的重要特色,《睡觉》中的小伙子与小美,《家事》中的三个高中生,《相爱的日子》中的两个在城市挣扎的无业大学生,包括《推拿》中的盲人们,当这个社会的弱者只能相拥取暖时,希望还在哪里?

也许,希望还是有的,否则这样的写作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毕飞宇在谈到这批小说的创作时说:“我是写小说的,我的立场很简单,那就是批判与怀疑。我不认为我的批判与怀疑有多大的作用,但是,写小说的人就是这样,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弱者,他有悲观的倾向,他对伤害有一种职业性的关注,然后是批判——与其说这是责任,不如说这是神经类型,小说家的气质与心智决定了他们只能这么干。一个小说家最大的困惑也许就在这里:即使他认为路必须是这么走的,他也要质疑,他也要批判的。”所以,并不是儿女情长,倒是批判,有时更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人道情怀。

来自福建茶乡安溪的女作家林筱聆的长篇小说新作《女镇长》(作家出版社2010年8月版),当属于官场小说。但由于它具有诸多独特的艺术元素,显出独特的艺术风貌,有别于当下文坛流行的官场小说。

小说描述了女镇长袁玫在官场上煎熬、挣扎的经历以及最后因陪酒失态而自杀的悲剧结局,展示了当下官场严峻而又近乎险恶的生态,塑造了一位既柔美又干练、刚烈的美女镇长的艺术形象,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小说由于对袁玫在官场和婚姻双重悲剧命运的书写,由于女作家独特的抒情化的叙述笔调,浸润着一种浓厚的抒情意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女镇长袁玫是小说的主人公,是作家着力刻画的艺术形象,这一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决定着小说的艺术质量。袁玫出身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上有姐姐袁瑾,下有妹妹袁菲,身居老二,是位聪明漂亮的姑娘。她上的是幼儿师范,能歌善舞;幼师毕业后,没有从事幼儿教育工作,而是分配到镇上的妇联,后来又升任柳县黎冬镇分管文教卫生的副镇长。在官场上,她既无过多的欲望,又无升官的野心,但在一次利用老同学许倩倩的二叔市委副书记的关系为丈夫胡成求取副科的活动中,被许副书记所赏识,许副书记的一句话,使她意外地提升为黎冬镇的镇长。当上了镇长之后,由于她敬业、尽职、能干,也干出了不错的政绩;前任遗留下的农贸市场闲置和高额的债务她顺利地解决了,镇里的工作理顺了;在招商引资上,她由于坚持环境保护为先的原则,在威迫利诱前不动摇,拒绝了黎冬镇外出的商人杨文元回迁电池厂的要求,并正确处理拟建电池厂征地村民上访的群发事件;关于开发黎云山旅游景区发展农家乐的计划也付诸实施了,她终于为山区百姓找到一条致富之路……但是自从当上了镇长,她就处在种种麻烦之中。她内要面对同丈夫胡成之间的婚姻危机,外要应付官场包括陪酒在内的种种应酬,尤其是对付来自原任镇长现任书记方有法的明枪暗箭;更麻烦的是,上要应对县长、县委书记之间不同派系的争斗,下要提防方有法等人处心积虑设下的陷阱,她穷于应付,疲惫不堪。作品有这么一段描写:“看方有法踱着方步慢慢走远,袁玫只觉一阵剧烈的恶心涌上喉头。她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这种逢场作戏的把戏,这么虚情假意的话自己竟然也能说不出来?天啊,人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蜕变的!把真诚蜕化为虚假——所谓的世故!把单纯蜕化成狡猾——所谓的成熟!”写出了袁玫对官场的这种感悟,尤其通过对墨不多的黎冬镇委书记方有法于世故、城府很深、阴险狡诈的形象的刻画,特别是他写信举荐广泛传播女镇长陪酒失态从而把她逼上绝路的举措,把官场的险恶之处揭示出来。故此,《女镇长》虽然不像别的官场小说那样写官场的腐败大案,刀光剑影,只写了一个女镇长在官场上的挣扎与悲剧结局,只侧面写了镇委书记方有法的某种侧面,却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当今官场某种要害之处,这便是它的独特之处,也是成功之处。

作为袁玫陪衬的袁家三姐妹的另外两个姐妹——大姐袁瑾和小妹袁菲,形象也是颇为鲜活的。大姐袁瑾是一个被婚姻一点点磨去了女人棱角的人物,她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和全职太太,最后落了个离婚回娘家的结局。小妹袁菲却是“80后”新女性的代表,她活泼甚至于泼辣,自我甚至太过于实际。袁瑾与袁菲的陪衬,使得袁玫作为一个女镇长在官场上的挣扎与最终自杀的悲剧性格显得更突出。比较起来,小说中男性的形象稍微逊色。除了对镇委书记方有法的描写尚可称道外,包括袁玫前夫胡成在内的诸多男性形象没能给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我比较喜欢林筱聆在《女镇长》中所展现的抒情性的叙事笔调,这种笔调对于展示女主人公袁玫的悲剧命运是很有好处的,而且具有一种吸引人读下去的叙事力量。因此,尽管《女镇长》还不能说有多么厚重与深刻,却凭着它诗性的书写,以及对于女镇长袁玫悲剧命运的深入开掘而征服了读者。因此,我们有理由充分肯定这部小说的思想及艺术价值。

■看小说

王凯《终将远去》 “远去的”与“永存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军旅题材作品是作家艺术能力的试金石,因为它的限制更多。那些能够游刃有余地书写军旅故事、再现军人生活、展示军人内心世界的作家,往往是艺术能力出众的作家。王凯无疑是这样的作家,他的《终将远去》(《解放军文艺》2010年第8期)是一篇优秀的军旅题材作品。

小说以某部老兵复退为背景展开故事。在这个敏感的时刻,连队里的每个人都敏感得厉害,因为他们不仅不想离开连队,而且还想在原来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为此,身为连长的“我”陷入深深的纠结之中,而“我”尤为纠结的是周文明。不仅仅因为这个“笨兵”一门心思地把军营当成了自己的家,一旦离开这个“家”,他几乎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也不仅仅因为几乎每位战友都觉得他应该留在军营内并因此为他创造条件,更因为他是这个连队的老指导员张安定惟一牵挂的亲戚,而老指导员为了连队,不仅流尽了血汗与泪水,最终还献出了生命。但百般纠结之后,“我”还是放弃了周文明,因为我想留下业务骨干李峰,想为“换装”后的部队留下最需要的人才。然而,最后几乎所有人都失望了,因为,不仅周文明没有留下,李峰也没有留下——留下的是不学无术的聂衡宝,他“上边”有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作者对军队内部问题的揭露是犀利的,但小说留给我们却不是黑暗与寒冷,而是希望与温暖,特别是小说中作为背景出现的理想人物张安定,像一座辉煌的灯塔,照亮了整篇小说,让我们看到:“远去的”只是战士们依依不舍的身影,而“永存”的,却是令人无法忘却的“袍泽之情”和“爱国之心”。

这部作品也提醒我们,只有抱着火热的情感突入生活、与生活搏击,我们才能获得摆脱“镣铐”的艺术能量。

周新天《心随野蜂飞》 换个视角看世界

当下的文学作品在表现农村时,要么仍然固守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模式,将农村描绘为被文明遗忘的角落;要么出于对农村的美好想象,将其渲染为乡村牧歌式的美的存在,以安放自己在城市中被碰撞得伤痕累累的心灵;要么出于摆脱都市欲望压抑的需要,将乡村放大为欲望的田野……在这个坐标内观察,周新天的《心随野蜂飞》(《中国铁路文艺》2010年第9期)虽然短小,却很有意义,因为作者没有沿袭主流视角,以“探险者”、“观光者”的眼睛审视乡村世界,而是用边民的眼睛,甚至用动物的眼睛观察世界,观察“外来者”,因而有了不一样的发现。

央金是边地的一位美女,她与蜜獾和响蜜鸟合作采集野蜂蜜,“她们”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央金的收入虽不那么多,可她过得悠然自得,乐在其中。然而,一位不期而至的摄影师打乱了这里的一切:他把央金采集蜂蜜的照片放到网上,引来了大批游客和观光者,这里原本恬静的生活驱动起来,混乱起来……在央金的眼里,在蜜獾和响蜜鸟的眼里,这些“外来者”不仅不那么“文明”,而且简直就是“野蛮”了,由此,小说把我们习以为常的艺术世界颠倒了过来,使我们在一个崭新的起点上思考“文明”与“愚昧”的冲突问题,思考文化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问题。

(鲁太光)

广告

邮发征订

文学史料

《新文学史料》(季刊)创刊于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以发表“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为主,同时刊登这个时期的文学论争、文艺思潮、文艺团体、文学流派、文学刊物等专题资料,及有关的调查、访问、研究、考证文章和不易见到的材料和图片等,是备受海内外读者和研究机构重视的名牌刊物。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18—162

每期定价18.00元
全年合计72.00元
编辑部全年办理
补订 邮购 零售

地址: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编辑部
电话:(010)65251611
邮编:100705

■短评

以乡村变革折射历史风云

□邓招华

李春棠的《无边风月》以张自忠主政湖南期间(抗日战争初期)推行的乡村基层政治机构调整、改革的民主化运动为背景,艺术地呈现了桥头镇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历程。李春棠曾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对相关历史事件的熟稔自然是其创作的一个优势,但是作为不同于历史研究的写作,这部小说的真正优势却在于作者为远逝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场景以及饱满的艺术形象,是对这一特殊“乡村民主运动”的文学记录。

张自忠抗日战争初期在湖南推行的乡村基层政治机构调整、改革的民主化运动为期不长,相对于他在战场上的显赫战绩也鲜为人知,但作者以敏锐的史学眼光察觉出了这一乡村民主化运动的潜在价值及历史意义,并以此为切入点渲染出此运动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品精巧地将这一特殊的“乡村民主运动”的发生、展开浓缩于桥头镇,在民间生存状态的细致呈示中,具体而微地以一个镇子的风云变幻折射出历史的复杂进程。在桥头镇,杨尚智、聂湄月、舒风等青年与严忍之、严不凡等乡村劣绅围绕民主变革运动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杨尚智、聂湄月等热血青年在章之仲(即张自忠)主政湖南整顿基层政权之前,已经在为振兴桥头镇不倦奔走,而舒风作为整顿基层政权的官方代表入驻桥头镇以后,这些青年义无反顾地掀起了一场乡村民主改革运动。无论是公开审判为非作歹的旧保长、直接民主选举新保长,还是废除诸多苛捐杂税等,都是以民主之利剑整肃、涤荡着腐朽的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中的污泥浊水。尽管不断遭到严忍之、严不凡等乡村劣绅的阻挠、破坏,“但确是一次地方行政改革的历史性的、真实的民主尝试。是桥头镇民众追求民主理想的一步跨越。”它将把民主之风吹进小镇的各个生活层面。作品也多方面再现了民主改革运动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影响,如妇女的解放、

各种社会团体的成立等。而在这一切叙述的背后,则是作者的一种深沉的人文关怀。

千百年来,特别是明清两代六百多年来,构筑在封闭、愚昧、落后平台上的专制主义的高度集权统治,压抑个性,摧残所谓异端的独立见解,推行思想禁锢与文字狱等极为荒唐的恐怖政策,对社会最大的戕害,就是给我们这个民族铸造了低劣的奴性与自卑。中华民族要振作、要发展,首先就要剿灭奴性、消释自卑。桥头镇的乡亲们虽然并不谙熟这个道理,但是,他们刚刚开始的民主生活,却在实践这个真理。

由此,可见作者的精神指归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描述一场“乡村民主运动”的尝试,而是将民主革新视为民族再生的一个重要精神资源。或许正由于此,作者对杨尚智、聂湄月、舒风等人作了理想化的描述,在他们身上铺陈了传统和现代的诸多美德,也寄予了作者的人文理想与道德激情,具有较浓郁的传奇色彩。不过,作品的真正力量不在这理想化的描述,而在对传统的基层政权组织的刻骨揭露。以严不凡为代表的乡绅势力掌控着乡村的基层政权,他们自私妄为,将公权力视为满足一己欲望的利器,利欲熏心,尽鱼肉百姓之能事。这种贪腐、颓败的基层政权既是此次民主整顿运动的目标,也是中国底层社会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根由。作品机智幽默又不无嘲讽地对乡绅群像进行了刻画,与其批判的艺术意图十分契合,既是一种文学的细节刻画,也具备了现实主义批判的文学力量。而这种现实主义批判与对杨尚智、聂湄月等青年的理想化描述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作品内部深层结构的二重协奏曲,显示出作者在理想的超越中观照现实,在现实中追求理想超越的艺术宏图,以及蕴含在这一艺术宏图背后的一种深邃的社会历史思索和真挚的人文关怀。这或许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

微型小说选刊

丢掉的工作 左春红
那场南辕北辙的青春伤痛 清山
我有一个初中学历的老师 童天红
钻戒 尤秀玲
人生会有几条路 郭震海
留父过年 马孝军
刀枪不入的人 梅纪国
蒙面人 青青
狗事 季明
负债 刘建超
给女巫看病 赵淑平
墙中人 十八须
望猴成龙 朱可人
酒话 陈子赤
笔记本上的秘密 赵谦
今年过年不收礼(外二则) 王雨
微笑实验 冷月潇潇
残疾人 黄克展

2010年第二十二期要目
主编:姚雪雪 主办: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26
电话:0791-8502782 8524703 邮发代号:44-22 定价:3.00元 全年72.00元

</div